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010—62806418

筑牢环境屏障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王成文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是前提、是基础、是关键。为推进新时期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政策”“建立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的指示，切实做到“四个最严格”，即坚持最严格的标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实行最严格的监管、执行最严格的问责。并以此为要求处理好科学发展与环境保护、全面治理与重点突破、持久作战与阶段目标、环保当先与部门联动，以及行政推进与其他手段“五大关系”，真正把环保工作作为硬任务来落实。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筑起牢固的环境屏障。

处理好科学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重要标志就是环境保护升级，重要前提就是发展理念升级。如何处理好环保与发展的关系，是探索环保新道路的根本所在。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招商引资、产业准入、项目论证、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必须把加强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作为基本前提来考核、来把握、来落实。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经济文明的迫切要求，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取主动的战略选择，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基本条件。必须严格坚持、牢牢把握。这就要求环保部门必须主动介入，严格把关，发挥好闸门、控制、调节、倒逼和引领的职能作用，环评审批、三同时验收要坚持从严，坚决不能允许未批先建、自行试产、超期试产。任何降低标准、视而不见、擅权行事、遮掩袒护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坚持在保护中发展。积极支持发展，跟踪服务，全程参与，在帮助中服务，在指导中服务，在协调中服务，在执法中服务。发展要的是科学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就是能够可持续的发展，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不能再走只讲规模、不讲质量的粗放式发展、低层次发展、内耗式发展的老路。要找准并认真把握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点、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以及社会和群众的容忍度，坚守生态和环保红线不能有丝毫的松动。对环保部门来说这才是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是真正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运用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来谋划环保工作。注重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作用，坚持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以环境标准推动产业升级。通过发挥环境影响评价“控制阀”、节能减排“紧箍咒”、环境标准“催化剂”等作用，有力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要下决心改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抓发展上有使不完的劲，有意想不到的创新，有解决问题的经验，可在抓环保上常常就陷入疲软，陷入困扰，缺少智慧和办法的状况，尽快培养和启用一批真正能够推进科学发展的干部和人才。

处理好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是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看问题、办事情，既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又要善抓主要矛盾，重点突破。要善于抓住工作的重心。每项工作都有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重心和要求。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要因时因地调整工作重心，不能平行推进。要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集中实施重点突破，通过重点突破带动工作整体推进。要善于针对不同任务的不同特点，紧紧抓住关键环节，创造性地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措施，以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上，抓住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的燃煤锅炉废气排放、建筑及拆迁施工扬尘、机动车尾气污染等主要因子，在着力控制燃煤污染、扬尘污染，污染以及工业废气污染四大污染方面，集中上下智慧和力量打好攻坚战。要针对不同区域人民群众的不同关注，切实把握好环境热点问题，畅通投诉渠道，认真加以解决，并及时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弹好钢琴，统筹推进。

处理好持久作战与阶段攻坚的关系。一方面，环境问题不是一时形成的，是长期建设与发展中积累的，况且我们的环境问题更有特殊性。正如中国环境宏观研究报告指出的“中国环境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面对，树立打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又是一项事关科学发展和人民健康的紧迫任务，社会广泛关注，群众热切期待，我们绝不能因为任重道远就按部就班，不能因为艰巨复杂就缺少主动，必须积极有为，不断向极限挑战，向更高目标迈进。要按照规律做好顶层设计，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系统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战略层面真正建立起严格有效的保护环境长效机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新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新优势。同时要树立并不断强化“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从战术层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确定积极的目标，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实施重点突破，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进行集中治理。这样集小胜为大胜，切实打好攻坚战，不断取得新成果，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决心，感受到治理解决的希望。

处理好环保当先与部门联动的关系。环境保护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巨。加之环境保护职能又分散在环保、发改、水利、交通、国土、建设等多个部门，存在着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仅仅依靠环保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各级环保部门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切实强化积极有为意识，主动发挥综合协调作用，不断探索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综合治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真正形成环保工作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和自觉行动。只有明确界定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权利、职责与任务，充分发挥环保当先与部门联动的作用，共同做到“定位不越位、定位不缺位、定位不错位”，才能在凝聚拓展“责无旁贷、奋勇当先”的使命意识中，把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处理好行政手段与其他手段的关系。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是现阶段推进我国管理环境的三种最基本的手段。新形势下，要不断完善行政手段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探索经济手段，切实加强法律手段，推进环保工作真正地从单纯依赖行政手段向综合使用法制、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转变。一是积极探索经济手段。进一步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贸易、科技等政策，对市场调节的价格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指导和监管。二是不断强化法律手段。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和基本制度建设的同时，坚持铁腕执法，铁面问责，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勇当保卫蓝天、守护清水的钢铁卫士。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的监管职能，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环境违法案件会商制度、联合办案制度和移送制度，形成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整体合力。通过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从根本上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三是切实用好行政手段。切实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完善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环境保护工作机制。

总之，环境保护部门是联系民生最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与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窗口部门和单位，必须把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期盼作为开展工作、检验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弘扬整风精神，牢牢把握“两个务必”，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切实强化环保为民意识，努力打造为民环保队伍，不断推动环保工作上水平、上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以反腐促团结

□李跃平　赖海榕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多次表达了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强有力地开展了打击腐败的工作，抓出了多个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反腐败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要向群众有所交代，还在于涉及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而干部队伍的团结则同样关系到执政的稳固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只有团结的干部队伍，才能保持组织的活力，才能释放正能量，才能保障政治稳定，才能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只要有了团结的干部队伍，哪怕其他方面的矛盾相当突出，我们也能克服困难，取得事业的进步。如果干部队伍团结出现问题，那就会出现大麻烦，其他不太突出的矛盾也会因为干部队伍的裂痕而十倍百倍地放大，导致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

干部队伍如何团结？没有私心的干部才能团结。私心是干部的一种政治病态。公权力的运行拒绝私心。一旦有私心，就会打小算盘，就会争权夺利，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汤，甚至劣马驱逐良马，就会坏大事。一旦私心膨胀，寻租腐败，破坏公权力运行和社会分配秩序，就会乱大局。进而形成一个个与党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利益集团，结果就会闹分裂。反腐败，就要治心病。治心病，首先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强身健体。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抑制领导干部出现私心和防止私心滋长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领导干部的私心。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权为民所赋的制度就是控制领导干部私心的根本制度。财产公开使领导干部不敢有私心；权为民所赋要求领导干部眼睛向下，时时刻刻想着怎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不能有私心。这两项制度的建立已经有所讨论，但是还没有真正破题，表明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越是困难，越说明其重要。关键不是要一步到位建立起来，而是要行动起来，迈出步伐，每一两年再向前迈一步，这样有个十年八年，我们的制度就建立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如离退休制度、有限任期制度、集体领导制度、新进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制度等等，哪一项是容易建立的？哪一项是忽然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哪一项不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经过长期努力逐渐建立起来的？因此，一定要有建立制度的决心、信心、耐心和行动。领导干部的私心问题解决了，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就有保障，各项事业取得长期稳定发展就有了保障。

剪不断，理还乱。腐败之所以猛烈，而且作为一个严重问题长期盘踞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就是因为许多领导干部有了病态的私心，而不能对症下药。我们应该打一场高水平的反腐战，不但要扑灭这些领导干部的炽热私心，抓出一个个腐败分子，还要从根子上扑灭所有领导干部出现私心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在“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建立起领导干部精英选育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用人机制、财产公开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起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运行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防止未来继续发生腐败，遏制正在发生的腐败，从而真正建立长效机制。

反腐促团结，团结出力量。打一场高水平的反腐战，不仅给人民群众一个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而且保障了干部队伍本身的精诚团结，从而创造出经济上长期稳定发展、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编译局）

“四风”积习的“冰冻层”心理机制

□王元华

最近，中纪委常委会议提出，铁面无私纠正“四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风”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说，“四风”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么，水面下面看不见的“冰冻层”则是盘根错节的体制痼疾和千百年积淀的人性幽暗的“集体无意识”。孟子曾说过：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而为长者折肢，是不为也。实际的情形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像“为长者折肢”一样不愿意深入基层和群众，而是像“挟泰山超北海”一样难以做到深入实际。这也许难以置信，但我们如果能对官本位造成的官员人性扭曲作一番探幽析微剖析，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权力崇拜”滋生“病态自负”

千百年官本位封建专制形成的“权力崇拜”已根深蒂固地深入民族集体意识的骨髓，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中国特色。今天，我国尽管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但政府权力仍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处于主宰、支配地位，官员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地位尊荣显赫，从政仍是众多年轻人驱之若鹜的选择。西方有则寓言：一个驴子背着圣像走在路上，人们纷纷对它顶礼膜拜，驴子趾高足扬起来。但是，官员们不会像驴子那么蠢。他心知肚明：人们崇拜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今天有权，会高朋满座；明天无权，就会门庭冷落。因此，他充满了世态炎凉的恐惧感和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而官场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更使他感到“身在官场不由己”的无归属感和飘泊感。现在，他的“官场焦虑症”越来越严重。

为了摆脱这种致命的“基本焦虑”，他更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自我理想化”获取认同感、优越感和重要感，同样，他还十分渴望得到不断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不同于常人、高人一等。他需要不断在大会、小会上作重要讲话，证明自己“理论水平高”；他需要不断出现在各个场合，出现在电视中、报纸上，以证明自己的“不可缺少”；他需要不断地力排众议、敢于拍板，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他需要 GDP、重大工程、各项指标、各项排名、掌声、鲜花、赞扬、口碑……久之，他会陶醉自己和他人共同营造的“理想形象”之中，“病态自负”已成了他生存的根基，这一切是真实，还是虚幻？是“通行证”，还是“墓志铭”？他并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害怕知道。不管怎么说，渐渐地，他变得刚愎、独断、专横、霸道。

官僚主义是“病态自负”的产物

为“病态自负”所驱使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卓越”，他已意识不到与事实的关联性。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理想”本身，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实际的疏离，使得他的“理想形象”像纸房子一样不真实，也一样脆弱，任何微弱的风都能吹倒它。所以，“病态自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避”。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较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时的粮食亩产几万斤的荒谬，如果说那么多的官员真的不明白，今天看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熟悉当时“比谁的卫星放得更高”的特定时代背景，就不会感到奇怪。

尽管正常思维的人看来，选择性的“无知”荒谬绝伦。但从“病态自负”的角度来看，选择性的“无知”出至他内心的真实需要，非但不荒谬，而且是符合内在的逻辑性的不二选择。“自我理想化”的根基是虚构和幻想，是十分岌岌可危的，就像冰块经不起阳光的照射一样，经不起与实际的接触。正由于面临的巨大危险，他对实际情况怀有极大的恐惧。在实际情形中，他是那样的脆弱，不堪一击。

面对来自实际情况的巨大威胁，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调动起浑身解数来打一场壁垒分明的“理想化自我”保卫战：符合“理想化”的“正面形象”必须大力宣传，而有违“理想化”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坚决打压。他之所以喜欢讲空话套话，是因为空话套话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正确废话”，能够显示他的“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下基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报纸电视记者前呼后拥，是因为这样能确保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时能够过滤掉有害的“实际情况”；他之所以高高在上，会山文海，是因为远离下层，隔绝真实，才能给他以安全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痛痒，是“病态自负”必然导致的选择性无知。只有官僚主义才能筑起保卫“自我理想化”的堡垒，也才能使他披上防护来自现实威胁的盔甲。

形式主义植根于“对权威的服从”

有了官僚主义的主子，就必然会产生形式主义的奴仆。反过来，形式主义的迎合又为虎作伥，助长了官僚主义的泛滥。为什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影相随、密不可分呢？

西方有个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这个实验揭示出“对权威的服从”：当个人进入权威系统后，会有一次心理重组的过程，“我”不再是能够按照个人意识行动的“我”，而是权威的“代理”。在这个代理状态下，“我”不再从人性的角度关注行为的正当性，而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现实生活中的“权威”又有怎样的期待呢？荷妮曾揭示了“病态自负”者的重要的神经症特征：由于“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出于克服焦虑的需要，“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但是，由于“理想”是臆想的产物，与“真实”之间有着巨大的悬殊，他拥有的“权威”越大，就越难摆脱“权威”像海市蜃楼转瞬即逝的恐惧，也就越来越需要依赖别人“对权威的服从”，来不断获取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的安全感。

中国古代的叶公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时，他感到安全、自在，但一旦遇见真龙，就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弃而还走”。这个寓言的隐喻是，人出于对现实中不可测因素的本能的恐惧，往往有着用虚构的“真实”代替狰狞现实的倾向。现实中官僚主义的衮衮“叶公”希望一切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摒除来自现实中不可测因素对“权威”的威胁。而形式主义有其“行”而无其“实”，是人造的“龙”，温顺可亲而狰狞可憎；是按照“叶公”想要的样子造出来的，也是能为“叶公”所能驾驭和控制的，所希望看到的“龙”。

世上本来就没有龙，我们祖先造出“龙”，那也是出于国人以服从权威而求得权威保护的心理需要。经常有官员这样讲：“我的一切都是组织上给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对他来说，“组织”是个巨大的权威系统，组织上可以给你一切，也可能夺走你的一切。他的上级掌握取舍与夺的权力。他作为依附体制的官员，在长时间适者生存的竞争中，悟出的一条生存之道是“只唯上”，把“对上级服从”奉为圭臬。他会认为，从政的艺术就是“贯彻落实”的艺术；他自诩的最有用的本事是能“吃透上情”，“摸清领导意图”。

“组织”这个权威系统又是由人操纵的，有时候，组织的“权威”又是上级主管官员特别是“一把手”个人意志的化身。如果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严重，那么，组织权威就很可能是官僚主义意志。臣服于官僚主义的意志，他为了投领导之所好，也只能以讲排场、比气势的种种形式主义做法，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他知道，因为干得好不好不重要，能不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才重要。为了从思想认识上、从行动上处处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在研究重大决策部署时，当“一把手”提出动议后，他决不会提出不同看法，只会不遗余力地证明领导动议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当上级领导布置开展某种活动时，他会闻风而动，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作道具，力求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以迎接领导视察和上级部门检查；当上级领导需要GDP等政绩时，他会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拔苗助长，让 GDP 等数字光鲜……

正是这种种放弃良知、违背理智、罔顾实际的盲从，使得形式主义越演越烈，为官僚主义大行其道而推波助澜。正如一个巴掌拍不响，许多重大决策失误都是由独断专横和无原则盲从共同造成的。

享乐主义是“重占有”的滥觞

追求快乐本是人的天性，但极端享乐主义和奢靡成性却是自毁、自戕的行为。“病态自负”为了追求“荣誉”“权威”，放弃了“真实”，放弃了“自我”。这就好比与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坠入了内心空虚、无价值感的心狱之中。为了获得安全，他必须不断地去“占有”。弗罗姆认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异化的病态生存。在古代社会，“重占有”往往表现“囤积型”，守财奴只有无休止地节俭和囤积，才感到安全。在今天“商品过剩社会中”，“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掉了，但却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为一度消费了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

这么多年来，公款大吃大喝为什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以前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少公款吃喝，是因为人家生活水平高，不愁吃、不愁喝。可是，当今天我国解决温饱后，吃喝之风却越演越烈。而且在“八项规定”利剑高悬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官员冒着顶风违纪、被查处的危险，变通方式、换个场所吃喝。为什么一些官员少不了宴请吃喝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身上之疾易去，心中之魔难除。这个“魔”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般的阴影：对“权威”失去的极度恐惧。对身为官员的他来说，有两个大限，也就有两大人生恐惧：除人生终有一死的大限外，当官还有终究要退休的大限。他也许会这样对退休满怀恐惧：退休是什么？退休就是等死。人生无常，朝不保夕以及宦海险恶、黄粱一梦，使得他今朝有酒今日醉。他不仅需要把酒醉当兴奋剂和麻醉剂，借酒浇愁，忘却烦恼和恐惧，换得片刻的安宁，而且更需要那种觥筹交错中被奉为座上宾那种众星捧月、尊贵显荣的感觉，使他觉得位高权重。当他习惯了这样的状态后，如果突然有几天没有人宴请，一种不祥之感就会袭上心头，感到周围充满了危机，从而产生猜忌……为了让他放心、安心、舒心，他的下级官员以及和他有着老关系的老板们，自然不敢怠慢，再危险，再困难，办法总是有的，该摆的筵席还是要摆的。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当他刚当上领导的秘书时，某次陪领导下去视察，看了下面准备的接待方案，可能会想，这样吃喝恐怕大象也会被撑死的。几天在酒宴间的连轴转，使得他苦不堪言，可是他的领导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等到后来他也成了领导，随着官阶步步晋升，他的大腹也越来越便便，风度翩翩地周旋于档次越来越高的频繁宴请中，他也越来越泰然处之、波澜不惊。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就像对酒精和药物依赖一样，他已无法摆脱对宴请的依赖。

荷妮说：“常见的情况是，撒一个谎通常会再撒第二个谎，然后再用第三个谎来支撑第二个谎，依此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蜘蛛般的谎言中不能逃脱。”正是浸淫于官本位依然盛行的不利处境中，一些官员面对“权威”和真实自我的冲突，采取了“病态自负”的伪解决，然后又把另一个伪解决加在这个伪解决上，一个个地重叠起来，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四风”积习甚深、冰冻三尺的渊源所在。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